

# 懵懂读书记

梁新阳

早些年，当地流行一句俗语：“再穷也不能‘穷’了孩子”。说的是经济条件再差，也不能耽误孩子去读书。学龄儿童上学这件事，政府重视，千家万户上心。

1969年初春，我刚7岁，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上学去了。那年，父亲回到家乡彩淳公社下塘小学任教，一年级扩招春季班，村里与我同龄的人都上了学。临时招生订购不到教材，父亲动手刻写蜡纸，用油墨手工印刷。我第一次领到的课本，便是父亲印制的“土教材”。

上学前，父亲用灶间板壁当黑板，写上几行粉笔字来教我，因而比同龄人多识几个字。村里有位长者，按辈份我称呼他相南大伯，留着齐耳长发，发型和脸庞有些像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“南霸天”，只不过脸上总笑呵呵的。在我读书识字后，他是第一个让我脸红心跳的“考官”。我读一年级时，他说要考考“小秀才”，问我“子”的中间一横写歪了，成了“子了”怎么念？还用小竹片

在地上划出这两个字。我霎时蒙住了，哪见过这样的怪字，第一次真切体会到读书的份量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新昌农村过春节蛮有仪式感，贴春联、放鞭炮、走亲戚……满满烟火味。村里的春联多出自父亲手笔，为邻里义务写春联延续了十几年。大年三十晚，父亲刚坐下吃年夜饭，又有乡邻拿着一沓红纸匆匆赶来，满脸歉意表示还得帮忙写些春联。父亲马上去厅堂铺开笔墨，裁纸写字，直到乡邻道谢离去。待人热情和气的父亲，在家中却时时用冷峻的目光和微微鼓起的面颊子，传递着一家之长的威严。正月初一大早，在父亲督促下，我和妹妹将饭桌当课桌，端端正正坐着学习，稍有懈怠便有父亲责备的眼光投来。邻居小朋友试着帮我们解围，点燃“百子炮”（拆散的鞭炮）一次次往我家门口扔，然后哈哈大笑跑开。门外欢快热闹的气氛，与屋内父亲严肃刻板的家教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

我对父亲严厉的管教产生“叛逆”情绪，经常用暗自阅读一些课外“闲书”来“磨洋工”。在打开的课本遮掩下，藏着另外一本书，有借来的“小人书”，也有从父亲书箱里偷淘出来的旧书刊。邻居有两册破旧连环画，缺头无尾，不知书名。借阅时叮嘱说，宣扬“封建迷信”的东西，要躲着偷偷看。一册连环画中，老牛会说话，通人性，帮助牛郎与下凡的仙女成亲；另一册，讲哪吒死后重生，脚踩风火轮神奇无比的故事。这两册“禁书”，完成了对一个山村少年的文学启蒙，让他感悟到文学作品是超越现实生活的，充满神奇魅力。

父亲后来因工作调动，除周日外很少回家。我仍在老家小学就读，课余时间相对宽松自由了，对父亲放在床下的几只纸箱产生兴趣。纸箱里装着一些旧报纸和少儿读物，我悄悄拣出感兴趣的来读。识字读书，如添了一扇看风景的窗户，眼界随之开阔。

# 高歌欢庆新春来

(散文)

石旭东

隆冬时节，三九严寒，但见树树红梅灼灼盛开，不禁又油然想起脍炙人口的小说《红岩》，耳边传来了悦耳动听的歌声《红梅赞》……

在我的记忆里，最好看的小说是《红岩》，最好听的歌曲是《红梅赞》。不是说小说《红岩》有着特别高明的作法，而是小说的故事太生动感人，让人回肠荡气，奋发向上；也不是说歌曲《红梅赞》有着特别的奥妙之处，而是曲子太优美、歌词太亮丽，赏心悦目、沁人心脾。

红梅，在五彩缤纷的鲜花世界里，也许只是一种普通的花儿，没有牡丹的鲜艳妩媚、风姿绰约，“众香国里最壮观”；也没有兰花的清幽高雅、无人自芳，“一香已足压千红”，然而，梅花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生活环境：崇山峻岭，悬崖峭壁，不择地势；寒冬腊月，三九严寒，无所畏惧。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“万花纷谢一时稀”，而梅花却是一枝独秀，格外隽永。梅花不仅外在俏丽，更具有勇于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风貌，陆游称她是“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则称她是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，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”。陆游笔下的梅花是谦谦君子洁身自好、孤芳自赏的品行，而毛主席笔下的梅花则是顽强拼搏、勇于自我牺牲、大公无私的革命者的精神风貌。

“白公馆”，是白色恐怖的象征，“渣滓洞”，是黑暗地狱的再世。它们终究有多少黑暗？有多少残酷？我是亲身去感受过了，不去不知道，一去吓一跳，较之迷信所传说中的“阴曹地府”有过之而无不及：一道道铁丝网紧紧围绕，一个个瞭望哨虎视眈眈，探照灯彻夜闪烁，“牢头兵”手不离枪；囚室里潮湿阴暗，油

灯如豆，吃喝拉撒共处一室，污臭熏人；睡硬板，盖破絮，吃猪食，就连“放风”也只有一屁股地方；而审讯室里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刑具：老虎凳、电椅子、煤火炉、竹签子、竹筷子、迷魂汤、辣椒水、吊索、钢鞭、撬杠、狼牙棒、烙铁、铁人桩、电刑、炮烙、腐刑、烹煮……五花八门，无其不有。囚室里是白天一团漆黑，而刑房里却是黑夜灯火通明，一边是痛断肝肠的尖叫，一边是歇斯底里的狞笑，“刽子手”是满脸横肉，青面獠牙，“革命者”是来时带血，去时断骨，数百名革命仁人志士在这里被折磨然而，白公馆、渣滓洞只是一方战场，革命斗争风起云涌，烈火燎原，遍及中华大地：杨靖宇、赵一曼、刘胡兰、杨开慧、董存瑞、黄继光、邱少云……不计其数的革命先烈都在前仆后继为新中国诞生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他们就像冰天雪地里的红梅一样顽强拼搏、殊死战斗：“红岩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”；他们身被囚禁，心系劳苦大众，脚踏镣铐，坚信黎明来到。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，重庆反动当局自末日来临，疯狂镇压革命仁人志士，就在这黑暗和黎明交替之际，他们笑对蓝天，视死如归，放声高唱：“到明天山城解放，红日高照，请代我向党来汇报，就说我永远是我党的儿女，我的心永远和母亲在一道……”一个个倒在枪口之下，如片片红梅，英灵凝聚，“昂首怒放花万朵，香飘云天外”；似片片红梅，忠魂汇集，“唤醒百花齐开放，高歌欢庆新春来”！

又见红梅灼灼盛开，马年新春即将到来，举国上下，精神抖擞，意气风发，扬鞭催马，万马奔腾，山花烂漫，前程似锦，让我们齐心协力，再创辉煌，告慰先烈在天之灵，让他们笑在“丛中”吧！

天  
娃  
山

虹舞祥年  
(俞晓委摄)



# 糖纸里的年味与乡愁

徐洪昉

腊月的风裹着寒意，却吹不散老家村庄里那缕袅袅的炊烟。空气中飘荡的甜香，是牛轧糖的味道，是祖母留给我的独特的年味记忆，也是心底那一缕柔软的乡愁。

儿时那老屋的厨房里，祖母在腊月里总是格外的忙碌。她系上那件蓝布围裙，在灶台前，像一位把灶火当画笔、糖浆作颜料的老手艺人。她将麦芽糖、红糖、奶粉和黄油一一摆开，这些朴素的食材，在她手中渐渐化作甜蜜的魔法。

熬糖是一门需要耐心的手艺，祖母将麦芽糖和红糖倒入铁锅，加少许清水，小火慢熬。糖液在锅中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渐渐泛起深褐色的光泽。甜香从锅边溢出，裹挟着柴火的烟火气，填满了整个屋子。我站在灶台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，仿佛此刻已经尝到了那绵软的香甜味道。

待糖液熬至“挂旗”状态，用筷子挑起能拉出细丝时，祖母便迅速倒入奶粉和融化的黄油。她的动作娴熟，铲子在锅中画着圈似的，糖浆与奶粉交融，渐渐凝成乳白色的团块。甜香弥漫在灶间愈发浓郁，仿佛连空气里都浮动糖浆的醇厚。

糖团出锅后，被倒在铺了油纸的案板上，祖

母用擀面杖将它轻轻压平，趁热切成小块。我总是忍不住偷吃几块，可那滚烫的糖块刚离开锅灶，手便被灼了一下，虽有点疼，却成了香甜滋味里甜蜜的代价。等糖块稍稍冷却，祖母便拿出珍藏的彩色糖纸，一颗一颗地包裹起来。

那些糖纸，红的像对联，绿的像新发的柳芽，黄的像初春的迎春花。我帮忙包糖，笨拙地折着糖纸的边角，偶尔偷塞一颗到嘴里，甜得眯起了眼睛。祖母拍开我的手说：“留着过年待客呢！”虽然她话是这样说，却任由我再抓几颗。

包好的牛轧糖被整齐地放进铁皮盒里，盒盖上那幅褪色的牡丹图案，曾是小镇供销社里最常见的款式。每次打开铁盒，那糖纸裹着的甜香，便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，轻轻缠住儿时的我，让喉咙里悄悄泛起得意，只盼着能立刻咬开那层糖纸，尝到那份甜。

如今，祖母已离开二十七年，但每到腊月期间，我总会想起儿时那间老屋的厨房里，她系着蓝布围裙，在灶台前熬糖的背影，以及那口铁锅、那把铲子、那些彩色的糖纸，它们曾静静守在老屋的灶台边，如今却成了勾起回忆的符号，成了记忆里最特别的气息。超市里的牛轧糖琳琅满

目，但在我心中，却总少了那份粗糙的真实与温馨。

去年回老家过年时，我特地到老屋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铁皮盒。打开时，混合着一点锈味和糖纸的甜香，那熟悉的气味，瞬间把我拽回了儿时的灶台边。这几年来，我也曾在超市里买过几种牌子的牛轧糖，却总也嚼不出祖母那锅糖浆的醇厚。后来才明白，那一锅糖里，浸透的不仅是手艺，更是祖母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我的疼爱。

牛轧糖的甜，是时光的凝练，它裹着柴火的烟熏，黏着糖纸的沙声，藏着铁盒的锈迹，更镌刻着祖母弯腰熬糖时，眼角皱纹里藏着的暖意。如今，我在异乡的厨房里，试图复刻那份味道，却总差了那一味——灶台边再无人替我试糖的火候。

腊月的风依旧冷，可每当我看到牛轧糖，这份甜香便如潮水漫过记忆的堤岸。祖母的身影仿佛又站在灶台前，用铲子轻轻铲起一颗糖，对我说：“防，尝尝，还烫着呢。”

唉，原来，乡愁从未远去，它只是化作一颗糖，在舌尖融化时，悄悄地补上了心口的那道缺，让所有的思念都有了确切的温度。



(徐佳摄)